

# 对海外华人华侨经济与中国关系的重新思考

洪嘉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100871)

**摘要:** 在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关系的问题上, 海外学者提出的“儒教资本主义”和“大中华共荣圈”, 都强调移居海外多年的华人华侨在经济甚至政治上仍然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论断难免有偏激之处和意识形态倾向。实际上海外华人华侨应是世界众多移民中的一支。

**关键词:** 儒教资本主义; 文明的冲突; 海外华人华侨; 经济关系

**中图分类号:** F 830.5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5409(2009)08-0032-03

近年来, 中国的崛起无疑成了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课题, 华人华侨问题也为各国学者所热切关注, 而海外华人华侨所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无疑集中在经济方面。无论是一直为东南亚和日本学者所热炒的“儒教资本主义”还是亨廷顿在其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中所说的“再次成型中的大中华共荣圈”, 都在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中引起了广泛反响。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日本学者中岛岭雄的《亚洲的繁荣与儒教资本主义》两本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中, 不难发现欧美学者和日本学者对华人华侨海外经济的偏激认识, 他们一方面过于夸大它的共性和整体性, 另一方面则一再暗示其与中国大陆具有超出经济的, 甚至政治上的联系。这种观点也成为了东南亚国家频现的排华和反华现象的诱因之一。

## 一、国外一些学者对海外华侨经济与中国关系上的观点及影响

依照中岛岭雄的观点, 他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 是因为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这个地区的国家都属于受中国传统影响的“儒教文化圈”。他还进一步指出, 所谓儒教文化圈是指“过去一直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因此也可以将这一地区称作汉字文化圈, 或者说筷子文化区。从地理上说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 日本、韩国、朝鲜、新加坡和越南, 东南亚的华人社会也应该包含在内。中岛认为, 儒教资本主义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是家族集体主义, 它不单是劳动组织, 而且导致企业成员的组织化, 并成为企业经营的规范; 二是学习主义, 或者说是集体学习和学习国家; 第三是“伦理的规范”。为了让自己的分析更加可信, 中岛岭雄利用以上提出的三点对东亚经济进行了更加系统的分析。强调源于中国大陆的儒家传统已经深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并形成了以所谓“儒家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东亚模式”。其中这点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他认为海外的华侨华人在企业管理中强调“以人为中心”、“协调人际关系”、“勤俭节约”、“注重教育”、“家族成员的团结协作”。

另外, 其他日本学者还应用了有关“竹网”(人际关系的网)的概念, 既中国经商传统中的私人关系方面。私人关系一方面使得交易建立在了“信用”的基础上, 从而使华人内部的交易效率大大提高, 提高了东亚公司和欧美公司的竞争力。另一方面, 华人企业的董事会除了包括传统的家庭成员之外, 还往往有着“功能董事”的存在, 这些“功能董事”往往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 这是东亚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几国的政治腐败的重要因素。这些从经济和企业管理角度细致的分析在当时中国和东南亚现象刚刚受到关注时十分流行, 并为西方的学者广泛接受,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但显然, 以上的所谓儒家经济内涵并非为中华民族所独有的, 它的很多核心内容是东南亚乃至世界各民族在生产实践中共同形成的。同时中岛岭雄在分析中把儒家文化认为是东亚经济成功的唯一重要因素,

收稿日期: 2009-03-03

作者简介: 洪嘉泽(1988—), 男, 黑龙江牡丹江人, 本科生, 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苏关系研究。

不免以偏盖全，夸大了在海外华人华侨经济成功中的重要性。其从经济和企业管理角度细致的分析在当时中国和东南亚现象刚刚受到关注时十分流行。

如果说日本学者的分析尚且有一定根据，那么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则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判断和无稽之谈。

按照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渐露端倪，而中国大陆作为最大的一块磁石，广泛地吸引着全球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的华人认同。在20世纪后半期，这里的经济起飞首先在50年代的日本展开，然后是四小龙的奇迹，现在的中国大陆、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以及正被影响的菲律宾和越南。这里，亨廷顿先生提醒我们，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中的三个都是人口为华人为主构成的地区（香港和台湾实际上都是中国的部分）。他认为正是这三个华人社会的崛起刺激了后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而硬权力又衍生出“软权力”。后者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反过来又对三条小龙，以及以上提到的，除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中国周边国家中的华人华侨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促使他们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及唤起了心理上中华民族的认同。

在1993年的世界银行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了“中华经济区”的字样，并宣称“中华经济区”已经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第四增长极”。于是亨廷顿联系历史，认为中国中心现象将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再次上演，“中华经济区”将演变成“中华帝国”，并且推论在这一地区的经济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将在“中华帝国”的复兴中起到重要作用：首先是经济上的支持和投奔，其次是文化上的回归，最后是政治上的再次认同。

新加坡是亨廷顿逻辑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他把李光耀在新加坡作的，关于新加坡的经济成功原因在于儒教的讲话不仅看作是新加坡树立不同于西方价值观的表现，还把其看成是华人占大多数的小国在政治上向北京靠拢的趋势。亨廷顿在评价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时认为中国用中立的方式吸引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建设，并且使华人实体倾向与中国。可以看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观点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

很明显，东南亚却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有着与亨廷顿的观点相似的想法，或者说把亨廷顿的文章接受为未来的一种可能。于是，像在以印度尼西亚为代表的这样国家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华情绪。在苏加诺时代（1950—1965）的华侨华人政策时好时坏，虽然中国政府为东南亚国家考虑消除了双重国籍政策，但印尼还是于1959、1960年颁布了两项旨在缩减华侨在印尼经济地位的法令。1963年，印尼又发生大规模的反华暴动，许多华人失去了财产和生计。东南亚经济危机被深受以上极端思想毒害的东南亚民族主义分子利用，他们认为华人华侨掌握了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命脉，是他们的资本外逃造成了本国的经济困难，进而导致了最近一次大规模排华暴乱在1998年5月的爆发，也称“五月骚乱”，作为统治阶级释放压力的替罪羊，数千华人失去生命。东南亚其他国家在政策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排华抑华现象，认为华人都是经济动物。越南统一后，打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旗号，越南政府禁止华侨从事渔、林、印刷等多种职业，还把许多华侨遣送到荒芜人烟的“新经济区”任其自生自灭。华人经济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可想而知。

## 二、对于华人经济地位的理性思考

对于日本学者的有关“儒教资本主义”理论，我们应承认其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说服力的，儒教传统的精髓对家庭的和睦、企业凝聚力的增强，甚至社会的稳定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对他们的优越性过分夸大也是不全面的。它只阐明了部分真相，远不是真理的全部。

第一，东南亚华人的成功并非遵循来自中国传统的“儒教资本主义传统”，而是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分不开的。他们的成功根本上来说是他们善于适应各国不同的商业环境和条件。第二，要是说儒家文化对华人企业家的影响存在的话，它也在慢慢减弱，新一代接受的西方训练和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已经不会中文或是祖上的方言，语言的割裂使得文化上的影响更加减弱。第三，从商业管理上来说，华侨华人的公司和产业和多数欧美成功公司一样具备了以西方标准为主的管理和奖惩模式，这些公司雇佣的是本地人，货源和倾销地也多是所在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经济上已经彻底的本地化了。并且由此来看，也很难想象这些商人还会保持一个与他们利益几乎无关的遥远国度的文化认同。

作者认为在本地寻求政治保障是每一个利益集团的天然倾向，他们在原著民具有强烈反华倾向的社会

中自然地会选择同所在国资本联合或是选择与当权者合作。与在中国的外国公司经常会贿赂中国地方官员而取得优惠政策一样,与官员的联系并不是儒家或者中国“竹网”的特有特点。

至于亨廷顿说中国正在利用海外华人资本扩大在东南亚影响,并恢复在19世纪以前的区域霸主地位的更进一步的指责,显然是毫无根据的。

首先,对于华人身份的认同。经过了几代的本土生活,大多数华人早已适应了所在国的身份认同。而且东南亚国家过去所采取的一系列的限制,乃至禁止华文教育的政策,使得华人获得全面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正规教育已不可能。经济实力较强的华人选择送下一代出国留学,而生活水平一般的华人往往选择接受本地的成本较低和应用较为方便的当地学校。

其次,海外华商作为一个整体的身份受到怀疑。海外的华人资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华人在海外经营的积累,海外华人的国籍已经是所在国的,所以资本也与中国再无关系,即便回国投资,也是作为一般性的外国资本而已。另一部分是中国民族资本的输出,而这一部分资本的经济体的总部设在中国,出国投资是利润上的考虑,无论是国内的资本还是国外的资本,本来就是投资者可以随意动用的,以此来证明中国政府能通过政治力量操纵这些资本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也过低估计了中国的民主化程度。

再次,关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问题。当然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经济中占有重要的比重,但是由于长期受到所在国的政治打压,华人的参政能力和经济实力实际上并不成正比。即便是在唯一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新加坡,其有关新加坡向北京靠拢的说法也是占不住的。在20世纪70年代,李光耀曾经造访中国,在当时李根本瞧不起经济上孱弱、政治上封闭的中国,也并没有被5000年文化所吸引,他在和中国领导人交流的时候坚持用英语就是例证。而后来之所以李光耀又大谈儒教文明在新加坡的重要性,是因为在当时的全球化背景之下,新加坡有被全盘西化从而失去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危机,作为政治上的应对,李提出了儒教文化优于西方的论断,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海外华人的“向心力”是搭不上的。

最后,从中国的外交政策上说,中国一直奉行的是独立自主,不干涉别国内政的策略。在上世纪50年代与东南亚各国建交时取消双重国籍,来保护兄弟国家的民族情感,就是例子。在海外华人普遍入籍本地之后,中国与华人经济的法理联系也从此割断。海外华人回国投资也主要是由于企业利润和发展的考虑,与所谓的“祖国情结”无关。

当然,得出以上的几点总结并不是说从此以后海外华人华侨经济就会淡出我们的视野。对于海外华人商业和我国的联系一直以来就存在两派观点。一种如前者,认为现今华人经济在传统上仍同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在将来尤其是中国日益强大的国际形势下,这种联系会扩大到文化的再认同以及政治的“联合”。他们强调历史经历在研究华人经济上的主导作用。而持相反意见的另一派则认为华人经济在海外的发 展同中国儒家传统毫无关系,之所以华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如此成功,当地的 政治经济因素起很大作用。历史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共同感是不足为道的。当然,两者的观点都有长处和偏差。前者过分强调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容易泛泛而谈,后者对当地政治经济的过分青睐又让他们的视野过于狭隘。

一直以来,不论是海外学者还是我们都把“华人华侨”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来研究,过多地强调了它的“特殊性”。当然,海外华人华侨经济在抗日战争之时确实为中国的胜利提供了一定支持,在我国目前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体制的安排之下,华侨仍然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群体得到照顾。但是,这些研究都忽视了一个即成事实,那就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形成与发展只是整个世界性移民潮流的一个分支。特别是东南亚华侨华人,几代甚至十几代以来就生于斯长于斯,多数年轻华侨华人已不能熟练运用汉语,他们早已将自己认同为当地人,在经济上自然也完全融入了所在国家。华人早已成为当地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民族——华族,它们与来自其他国家与大洲的各民族一样,已经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来。所以,在看待海外华人经济与中国的关系的时候,应该跳出“中国一直都是亚洲主导大国,而我研究的对象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这样的圈圈,才能在其地位上作出全面的考量。

#### 参考文献:

- [1] SAMUEL P. HUNTINGTON.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2
- [2] 颜滢清. 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 [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 [3] 吴晶. 华侨华人研究论丛 [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6

责任编辑: 遇永仁